

技术—文化—价值: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引领的三重逻辑

付安玲¹, 肖朝霞²

(1、2.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100)

[摘要]新媒体既提供多种意识形态网络表达的文化载体,又导致意识形态网络治理的“算法困境”,为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境遇,并使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在技术、文化与价值层面表现为三重逻辑:解构与重构的技术逻辑,涉及新媒体“技术赋权”与资本操控信息传播的相互联系;冲突与契合的文化逻辑,关涉新媒体多元价值与文化引领的对立统一;现实与未来的价值逻辑,关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的相互支撑。审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三重逻辑,探究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相互耦合的内在关系,是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化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新媒体; 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引领; 张力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08(2022)04-0019-06

DOI: 10.16133/j.cnki.xxlt.2022.04.004

依托于数字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新媒体的发展与应用打破了传统媒介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方式,构建了各种意识形态网络传播与表达的文化载体。同时,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普及,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的新媒体平台兴起,算法代替大众媒体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把关人”。文化表达的价值迭代与智能算法的传播逻辑使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之间表现为技术、文化与价值层面的三重逻辑。深入探究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相互耦合的内在关系,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化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构与重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技术逻辑

当前,网络场域内的意识形态引领已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媒体的“技术赋权”赋予了普通公众进行内容生产的权力,推动了媒介权力的普及,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力日渐式微,难以实现“以言取效”。同时,控制新媒体技术运用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依旧是资本意志的诡辩。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技术逻辑是新媒体“技术赋权”与资本意志相互“勾连策动”的产物。因此,新媒体“技术赋权”对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解构,必然包含资本的重构过程。

[收稿日期] 2021-12-27

[基金项目]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势学科)“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建设机制研究”(19BYSJ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付安玲(1981—),女,山东青州人,法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员、讲座教授; 2. 肖朝霞(1996—),女,山东青岛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新媒体“技术赋权”对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解构

其一 新媒体“技术赋权”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主导力。在纵横交错的网络空间内,信息权力的转移和分化,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导致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的中心地位正在被瓦解;表面化、瞬时化、全球化的网络信息和多向度、立体化的媒介信息传播形式,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呈现去中心化态势。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人们的话语热情和表现欲望,永远在线带来的“日不落狂欢”和“广场式狂欢”让每一个人都能以娱乐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1],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原本叙事的完整性。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原本的权威性、专业性正在弱化,娱乐化、生活化、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生态正在被塑造,由此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群体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情感共识的引领。同时,在点对点、面对面的交互式传播机制下,网络场域内对突发、重大事件的报道或讨论往往形成一呼百应甚至一呼万应的空前盛况,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讨论必然会涉及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而技术逻辑裹挟下的智能算法,取代了权威媒体传统的“把关人”角色,网络信息传播呈现自由化、开放化、个性化的趋势。这种低门槛、碎片化、自由化的话语叙事模式,使人们沉溺于娱乐化的产品消费中无法自拔,现实性需求逐渐被有目的性、有计划性的诱导所替代,从而陷入智能算法技术操控的泥潭,严重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

其二 新媒体“技术赋权”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凝聚力。在当前的新媒体平台中,以微博、抖音、微信为代表的客户端成为社会舆论生成、演化与流通的关键一环,“微博实时热搜榜”“抖音热搜榜”“豆瓣爆料”等正在逐渐成为当今网络社会舆论衍生与传播的助推器。“技术赋权”下话语平台的多元化,恰好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争奇斗艳”的新领地,新自由主义、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当代物质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都企图利用新媒体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席之地。此外,除去平台的多元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

泛在化,新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导致网络空间的话语主体也呈现多元性特征。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权力源和影响源,网络社会政治在广泛参与新媒体的实践中实现自我赋权^[2],话语主导权不再集中在少数社会精英手中,更多的普通大众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优势,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多元化的话语主体改写了传统媒介时代的话语分配格局与权力结构,多元化、动态化、自由化的话语呈现形式超越了以往单向度的话语生产模式与表达方式,话语平台与话语载体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呈现与表达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去中心化、扁平化的话语结构,使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凝聚性受到一定的冲击。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一些新媒体平台会蓄意向网络公众输送各种非主流价值观,甚至是各种负面信息和错误价值观等,这种负面信息或者错误价值观的传播,不断拉大了网络公众与事实真相或主流价值之间的距离,导致网络价值观分化日益加深,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鸿沟。

(二) 资本操控信息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重构

第一,资本运作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格局。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强弱已成为当今国际话语场域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具体而言,资本催生下的新媒体技术革命和传播领域的变迁,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转变的动力之源,建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互联网传播的新型生态。资本介入加大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无序性,加之算法技术对公众需求的精准把控,弱化理性、消解认同、强化偏见等手段使网络风向呈现消极态势。在资本为王的虚拟社会中,部分网络新媒体沦为资本追逐商业利益的“洗脑工具”,大量非主流的声音沉渣泛起,通过引发舆论爆点操控网络舆论走向,不断挤压主流声音的存在空间。然而,伴随着资本与新媒体的日益耦合,受到资本意志操控的各类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通过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与输送,借助新媒体平台深刻影响了公众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应当通过国有资本实现对新媒体的把控,牢牢掌握大媒体平台的

主动权与发言权。这不仅能够有效控制网络信息的无序传播,阻断技术逻辑引发的传播生态畸形,还能够有效化解主流价值观与人们思想文化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从而弥补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认知缝隙,提升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认可与期待等都在网络媒体中得以传播,正面意义得以彰显^[3]。

第二,资本介入变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格局。网络场域已成为全球媒介产业和文化产品最庞大、最丰富的集散地与输出地。随着资本意志对新媒体领域的深入渗透,资本介入使众多新媒体成为西方国家“出口”西方价值、西方思想、西方言论的网络发声器,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优势企图控制和抢占我国各类媒体的话语权,通过培植网络公知、水军等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渗透,通过制造虚假信息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利用舆论风暴搅乱网络舆论走向、操控话语议题为资本服务,使有意识的文化消费过程转变为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此外,境外资本受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纷纷投靠西方意识形态的阵营,其网络发声与态度立场镌刻着深厚的西式烙印,从而不断挑战与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在资本意志操纵下,主流话语仍处于弱势,理性的话语难以得到抒发。新型传播技术借助自身技术优势对舆论领域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改造力,而政府在舆论工作中亦可借鉴和运用这种影响力。政府通过新型传播技术发布和传播信息,一方面能够同民众打成一片,增强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进而在舆论传播领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作手段的拓展有效提升和增强政府对舆论的操控能力,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又保证舆论的健康稳定发展^[4]。因此,要赢得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话语权,就必须实现国有资本掌握主流媒体平台。依赖新媒体强大的话语内容生产能力,能够将具有主流价值特色的文化产品注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从而引领网络舆论走向。此外,国家要加大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形成监管

合力,严防严控民间资本与境外资本的输入与渗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舆论压力和话语失控。

二、冲突与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文化逻辑

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之间的文化逻辑在于新媒体的多元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冲突与契合。它一方面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陷入多元文化交织的引领困境,另一方面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精准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新媒体多元价值与文化引领的对立统一性,促使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在与新媒体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实现先进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一) 新媒体的多元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冲突

一是新媒体的碎片化消弭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系统性。作为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兴媒介形式,新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成为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流动的典型特征,新媒体迅速发展、普及,并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个角落。碎片化的信息呈现形式与多元化的网络媒介类型,构建了纷繁复杂的多元信息传播结构,打破了传统媒体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系统性。网络信息与新媒体的碎片化必然会引发新媒体场域价值观念的碎片化,而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剧了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向。新媒介技术所构建的虚拟文化领域逐渐成为主流价值与多元文化价值“过招”的主阵地,既存在非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思想论争,又存在反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交融交锋,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难以跨越的思想鸿沟。同时,低门槛、开放性、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更是离散了主流价值观念传播与引领的系统性、完整性,使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更加难以调和,导致网络群体价值观良莠不齐,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工作无法全面铺开,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又为多元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契机,新媒体的去中心

化、碎片化、虚拟化等特征使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嵌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价值观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的主流价值观稳步发展,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价值观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文化保守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等社会思潮此消彼长,“中国霸权论”“中国病毒论”“中国强权论”等西方价值观不断渗透。多元化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在这一特殊的“对话空间”内“明争暗斗”,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面临更大挑战。

二是新媒体的平权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权威性。区别于传统媒体信息的完整呈现和层层把关,新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形式与泛在性阅读方式,致使传统媒介的“把关人”角色弱化、官方媒体的话语权分化、主流价值理念异化,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角色合二为一,“全民皆记者”“人人手握麦克风”成为新媒体格局下的独特风景,传播者可以通过特定的文字、符号、图片,借助各种各样的媒介平台发表、宣传自己的观点言论和价值判断。新媒体技术在赋予主客体更多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导致话语权的扩大与滥用。随着传统媒体权威的消解、媒介样态的快速更迭,信息从四面八方碎片化地汇聚到一起,百万种非主流的声音、观点不断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网络场域内,各类民族分裂分子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渗透式地传播民族分裂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宗教极端分子可以通过微博、微信隐秘地散播各种邪教教义或者某种宗教激进主义思潮^[5]。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大量散播“学好英语从开始学会看美剧、英剧开始”,不断输入蕴含西方价值理念的文化产品,加紧推送展现西方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内容,借以美化西方价值观念,以完成西方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力图构建网络空间内的“西式全球化”的国际传播和文化格局。此外,新媒体技术主张的去中心化、平权化和开放性精神,导致网络用户极易以自我利益与需求为事实参照,忽视信息或事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从而弱化了人们思维的研判性与逻辑性。

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实现对社会多元文化的价值引领,成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 新媒体的文化引领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契合

新媒体技术的日臻成熟,打破了传统媒介格局中的媒介形式、宣传方式、互动模式以及受众地位,新媒体日益成为互联网领域文化建设的主渠道。新媒体对主流价值和先进思想文化的有效精准传播,彰显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其一,媒介的深度融合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力。新媒体凭借强大的交互性特征在加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程的同时,在互联网领域延伸出全新的发展空间。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激发出信息生产模式与传播方式的创新,因此,对推动媒介深度融合,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全力打造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新媒介生态,扩大主流价值辐射版图等,主流媒体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成为 2020 年中国新媒体大会全新论点。面对异军突起的新媒体,传统媒体纷纷加紧步伐实现其数字化转型,主动适应媒介格局的转化,整合碎片化资源,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以期形成巨大的引领合力。2020 年,人民网研究院发布了《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考察的 377 家党报在各个渠道的覆盖率均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增长,全部党报的网站开通率依旧最高,为 96.8%;微信平台 and 聚合新闻客户端的入驻率均接近 90%;84.4% 的党报开通了抖音账号,较 2019 年增长更快;78.8% 的党报建设了自有新闻客户端(App);76.1% 的党报入驻微博平台^[6]。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政府网、中国理论网等官方门户网站通过线上宣传党的相关理论、思想和政策,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网络舆论引导格局,初步建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阵地。各主流媒体依托于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社交平台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使主流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吸引力与聚合力。

其二,新媒体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搭建起广阔的宣传平台。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开

放性等特征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态格局,赋予了群众表达权,草根阶层也能参与社会讨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大大增强。新媒体所特有的交互性特征,打破了以往的时空隔阂与物理界限,创设出一个跨国界、跨地区、跨领域的全新信息流动空间。新媒体搭建的信息平台使人类进入一个泛文化的传播时代,各种文化以立体的符号形式存在,为所有人提供了分享不同文化层次的机会^[7]。这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方式的多样化等高度契合,使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群众基础大大增强,也使主流价值的话语风格更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能够通过创建有形、有色、会说、会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通过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新媒体平台是互联网技术演变下的全新载体,只有主流价值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三、现实与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价值逻辑

要坚持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建构起检验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现实与未来之间彼此契合的媒介环节,基于新媒体时代多元价值所带来的诸多风险与挑战,更为客观地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建设的未来可能。更为全面地理解这种可能性的前提在于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现实因素,彼此循环往复,在这种统一性中,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贡献更多的批判性与建构性成果,这便是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价值逻辑的内在解读。

(一)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现实价值

其一,网络空间复杂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在新兴媒介融合条件下,数字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平权化、不可控化等特征愈演愈烈,激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的矛盾。习近平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

误。”^[8]不同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话语的裂变式传播使信息传播的时效、速度和范围已经实现华丽转身,信息传播的渗透力空前增强,多元社会思潮对网民的思想观念、情感共识等的影响更加深刻,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当前各种思想文化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价值观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在新媒体时代多维的网络空间内,如何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答案不仅关系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的有效发挥,而且关乎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大局。

其二,价值信仰模糊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虚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和教化社会大众思想和行为的作用,能够使之符合统治阶级所认可和提倡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进而动员社会成员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9]。但当前,新媒体技术的接入、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与阅读方式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不可控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新媒体技术的平权化、网络群体的多元化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逻辑性与学理性。多元化的信息主体受制于生活水平、地域差异、年龄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在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多样性特征,网络主体素质的差异性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和网络话语生态带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完整性受到影响,甚至呈现“被遮蔽或被裁剪”状态^[10]。在新媒体的加持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更加难以调和,导致网络群体价值观良莠不齐,由此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群体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情感共识的引领,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广度。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未来价值

一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价值需求。统治阶级不是仅仅通过拥有权力这一事实来

使权力正当化的,而是试图为之寻找一个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把它表现为人们通常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的逻辑的必然结果^[11]。实际上,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我国进行强势性、遏制性的意识形态殖民与价值观渗透。防范化解网络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阻止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持续渗透,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着力突出主流价值的引领导向,是当前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关键一环。不断加强网络空间的主流价值引领,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主流价值理念涵养人民的思想观念、道德理念和价值认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主体价值。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网络空间的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揭露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错误、实质和危害^[12]。要坚持批判性思维与建构性思维的统一,在揭开西方意识形态真实面具的过程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

二是有效契合网络媒介未来高速发展的价值

选择。新媒体传播裂变式、碎片化、无序性的特征,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激烈“角逐”,都大大加剧了网络场域内意识形态引领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这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基于新媒体的大众化特征,人人可以通过新媒体、自媒体、微媒体平台开展对话与交流,新媒介技术更是开辟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交流的全新话语空间与话语平台,吸引了更多网民了解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意蕴,从而不断扩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而忽视新媒体平台对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能动作用,将会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落后于时代要求,弱化其生命力与凝聚力,无法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借助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迎合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境遇,有助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表征建立在全民参与、共同创造与表达、实时共享的基础上。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的提升,不仅要借助技术层面的发展与创新,而且应注重思想层面和素养层面的培育与引领,以期实现意识形态真正的育人价值与变革公民素质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5]张林. 自媒体“舆论圆桌”的意识形态负效应及其治理[J]. 理论导刊, 2020(12): 82~89.
- [2]陈浩, 吴世文. 新媒体事件中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J]. 新闻前哨, 2008(12): 41~44.
- [3][4]黄楚新, 郭海威. 论资本影响与媒体舆论的博弈[J]. 国际新闻界, 2018(11): 87~90.
- [6]人民网研究院. 2020 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EB/OL]. <http://yjy.people.com.cn/n1/2020/1228/c244560-31981230.html>.
- [7]陈伟军. 社会思潮传播与核心价值引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66.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86.
- [9]尤国珍. 中外比较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与首善之区建设[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17.
- [10]赵丽涛.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0): 78~85.
- [11][意]加斯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贾鹤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1.
- [12]骆郁廷, 李恩. 网络空间西方价值渗透及其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2): 121~126.

[责任编辑: 李曼]